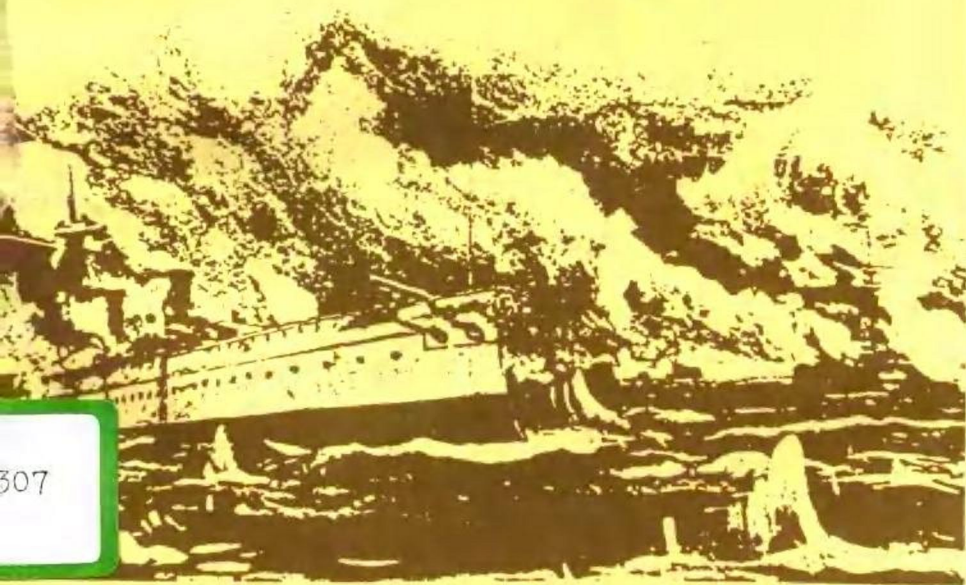


JIAWU ZHANZHENG QISHILU JIAWU ZHANZHENG QISHILU

甲午战争 启示录

孙克复 焦润明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307

96
K256.307
3
2

甲午战争启示录

孙克复 焦润明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C 239267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战争启示录/孙克复等主编. —沈阳:辽宁
人民出版社, 1995. 1

ISBN 7-205-03119-2

I. 甲...

I. 孙...

II. 历史—中国

IV. K

PA52/03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212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16,000 印张: 10 $\frac{1}{8}$

印数: 1—1,000

315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中平
那荣利

责任校对: 安丽君
刘再升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定价: 10.00元

05000

03

主 编:孙克复 焦润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魁喜 王 珊 刘恩格

关 捷 孙立祥 孙克复

孙 放 李荣华 杨惠萍

佟春林 张立真 张春艳

董守义 焦润明 潘 科

前 言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影响深远、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耻辱的战争。它不仅使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文化母国形象彻底坍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而且使西方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华民族陷入了危机和灾难的深渊。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心灵上的震动也是巨大的，它唤醒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前赴后继地浴血奋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甲午战争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是一个独立和初步繁荣并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那种落后和屈辱都早已不复存在。远离耻辱的年代、置身于和平宁静的环境中，使我们能够更冷静、更理性地看待甲午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去反思。特别是当全民族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用新的思路、从新的视角总结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现实。

我们认为，“知耻”应当是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教训的最重要思路。《中庸》上讲：“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只有感受到耻辱，他才会找到雪耻的办法；一个民族只有永远不忘记先辈遭受的耻辱，她才会有不断充实奋进的动力。甲午战争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关于“耻”的思考：我们何以遭受甲午之耻？怎样认识甲午之耻？如

何才能避免甲午之耻?等等。我们希望,从知耻的角度重新认识甲午战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定会使世人从中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示。

甲午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但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从日本而言,这场战争是其蓄意发动和制造的侵略战争。从中国而言,这场战争则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道义的反侵略战争。当然就交战国双方而言,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和成就的较量。日本何以胜?中国何以败?它与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军队装备、国民素质有什么关系?当时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环境有哪些异同差异?从这次战争中我们在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能获得哪些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是本书所要探讨的。

本书在写作风格上,突破述而不论、就事论事的笔法,着意于历史意识和现实感的结合,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历史内容成为现实生活理念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将甲午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放到近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大背景去加以考察,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大时空地架构由此引发的历史内容,着力挖掘种种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本书在体例上采取专题论述、整体组合的方式,文与文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它既有对甲午战争这一问题横的阐释,又有对这一问题纵的论述。

总之,这本书是我们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对甲午战争问题的新思考,希望能引起学者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兴趣,注重对历史内容深层原因的挖掘,增添更多新的学术成果。

书中的错误和不足,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百年后的思索：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启示	1
甲午英魂祭：让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36
甲午战争：中国近代化的考验	77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觉醒	96
国际关系对甲午战争之影响及其启示	133
甲午战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启示	160
近代中日两国政体对甲午战争的制约与影响	186
从中日近代教育的差异看甲午战争的胜负	206
甲午战争与法制问题	239
百年沧桑勿忘国耻	269
后 记	315

百年后的思索：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避免落后挨打就要及时把握历史机遇

落后就要挨打，这早已被近代的历史所证明，并且也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1840年以来，由于中国传统的长矛大刀劣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所以与西方列强相抗屡屡见败。然而甲午战争中竟败于被中国人所轻视的东亚蕞尔小国——日本，而且败得那样惨，这却是中国人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所引发的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也比以往更加深刻。近百年来许多人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甲午战争中日的胜败原因，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甲午战前中日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已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产生恰恰就在于中日两国对早期近代化机遇的把握上。因此，它自然构成了决定甲午战争胜负的远因。

对于一场战争胜负的评价，人们常常只看到战争时机、指挥技能、装备等因素，而往往忽略了决定战争胜负背后的远因。这个远因很可能是几年前或几十年前为某次特定战争准备的各种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综合国力。对于一场决定一个民族某个时期、某个阶段命运的重大战争的胜负，这种远因会显得尤

为重要。甲午战争对日本来说，其胜利既是其把握近代化机遇的结果，又是其于甲午战后国运腾飞机遇的开始。而对于中国来说，其失败既是对其未能及时把握社会变革机遇的惩罚，又是丧失其未来机遇的导因。历史老人总是毫不偏袒地把机遇降给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及时适应外界变化的民族。

（一）甲午战争对于日本，既是其把握近代化机遇的结果，又是其甲午战后国运腾飞机遇的开始

不可否认，在甲午战争以前，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程度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首先，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到 1894 年前，已经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体制，使各小诸侯陆续交出土地和人民，消除地域性封建割据，接着又废除了诸侯称号、封建门第身分的特权和差别，规定四民平等，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近代宪法，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社会政体也逐渐向资本主义政体过渡。这一点与清王朝仍然维持着封建专制政体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次，在甲午战前，日本已在轻纺工业方面展开了产业革命。1882 年，东京第一国立银行行长澁泽荣一集资 25 万日元创办大阪纺织公司，标志着日本产业革命的开始。大阪纺织公司的成功以及丰厚的利润有力地刺激了民间资本。自 1886 至 1890 年，东京、钟渊、平野、摄津、尾崎等大约 20 个纺织公司先后成立。1890 年，日本纱产量约达 10 万件，开始与进口纱抗衡。此外私人资本还投资于铁路建设。从 1884—1894 年的甲午战前 10 年间，铁路增长了 6 倍多，船舶和煤增长了近 3 倍，生丝和铁生产指数增长 1 至 2 倍，棉纱、棉织品、丝织品等在已有显著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增长 1 至 2 倍以上。所有这些数字都说明在甲午战前，日本经济实力明显增长。与此相对，清王

朝在甲午战前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工业革命。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但是这些机器工业并不是中国封建经济逐渐瓦解的标志，它不仅不能带动和推进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进程。一是由于这些机器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主，其产品并不进入流通领域；其二，这些军事工业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封建官府的垄断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总之，由于以上原因，决定这些封建官府垄断的非生产性的军事工业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也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缫丝业、扎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和印刷业。此外，在轻工业方面有豆饼制造、机器制茶、制糖、制玻璃、制冰、制药、碾米等行业，都是较小规模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不仅投资少，规模不大，而且也不能从总体上左右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再加上封建制度的束缚、外国资本的压迫，中国在1894年前始终缺乏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整个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这与日本经济上的活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在甲午战前，中日两国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作为一种背景原因，不可能不对甲午战争的最后结局产生影响。

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中日最初对近代化机遇的把握上。中日同为东方国家，18世纪末叶就已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文明影响，几乎是在相同的时空中，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1793年马嘎尔尼作为英国使节来到中国，目的是想与中国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使中国向英国开放市场。他带来了天象仪、数学

仪器、经纬仪、光学器械、望远镜、测量器械、化学器械、电气器械等等，从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筹办的工业革命新产品，企图使清朝要人有一种近代化的觉醒，甚至希望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打开通向近代化的大门。但是，马嘎尔尼的设想并没有给清政府带来任何刺激，反而把这些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视为朝贡之物，贴上了“朝贡国英吉利贡物”的标签。并且再次重申中华帝国的传统理论：“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待，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¹⁾这说明，清政府仍然按照传统的观念把这些工业品当做奇技淫巧的贡品看待，认为西方产业革命的成果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一次可以了解西方刚刚开始工业革命动向的机会，就这样被漫不经心地放过去了。与此相对，日本对外来新事物的反应与中国截然不同。日本由于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惯性和原因，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认同的价值选择标准，即一切有用的东西，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应该认识和学习的东西。18世纪末，与马嘎尔尼给中国带来产业革命新产品的同时，荷兰商船也同样给日本带去了产业革命的产品，立即引起了日本人对西方这些新型机械器具的敏锐反应。兰学家杉田玄白在他的《兰学事始》一书中，就日本人对西方机器器具的敏锐反应，有如下的描述：“从此，世人遂对该国（荷兰）远来之物感到新奇，喜爱其舶来之一切珍品，不论多少，闻稍有好事者无不常收集之。尤以正值相良侯（田沼意次）当道执政时，世上适为华美繁华之最盛期，彼船（荷兰）年年运入晴雨表、寒暑表、来顿瓶（震雷测验器）、比

重计、暗箱摄影机、幻灯机、遮光镜、扩音机等各种物品，此外，各种钟表、望远镜和玻璃制品之类为数甚多，大家深为这些东西之奇巧所吸引，赞叹其穷理之微妙。自然，每年春天当荷兰人参谒幕府时，其居处聚会之人甚多。”⁽²⁾总之，日本人一接触到新的外来文明时，就立即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好奇心，这一点在杉田玄白的著述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这种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文化传统所淀积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不能不说由此影响到了对近代化机遇的把握上。对于中国来说，1840年以前，对西方以及外界特别是西方的认识，不仅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鸦片战争期间，文人汪仲洋在他的一首诗中，曾把英国人描写成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有着碧绿的眼睛，惧怕阳光，甚至中午都不敢睁开眼睛。⁽³⁾连身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裕谦也认为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两腿，所以，如果他们挨打便会立即倒下。⁽⁴⁾这是何等的无知！另外，还有许多对西方人颇为荒诞的认识。人们普遍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而且外国人对这种产品的进口也是非常明显的，因而，许多中国人坚信，外国人需要的茶叶和大黄如此之多，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患上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极致，而不涉及到人身的生死问题。⁽⁵⁾但关于茶叶和大黄与西方人关系的错误认识已深入人心，极少数人的正确认识起不到任何有效的作用。从上述可以看出，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对欧洲人和西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多么肤浅，更不要说对西方国力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了。只是鸦片战争英国人打败了老大帝国，中国统

治阶层才开始注意域外问题。这些与日本有明显不同。

日本当德川幕府中叶镇压岛原起义后，为禁天主教也同清朝一样实行海禁政策。在1633年、1639年、1641年数次发布锁国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与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幕府了解外界信息，仅由荷兰商馆提供。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近代西方文明事物仍能通过长崎这个贸易窗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并且在当时日本人口流动以及从外国输入文明事物都受到严格限制的状态下，还出现了几个研究洋学的集团。其中两个最为重要：一个是作为幕府与在长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的翻译集团；另一个是被地方大名雇佣的常住江户的医生们，他们对日本输入近代科学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为实施殖产兴业政策，注重实际学问，关心荷兰的天文、历学等，允许数名家臣学习兰学，同时也放松了对汉译西籍的检查。自此，西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将军吉宗还亲自向荷兰商馆馆长询问有关天文、地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客观上等于默认了洋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家们获得了通过荷兰语接触西洋科学知识的机会，而江户的医生们（兰医）则通过荷兰商馆馆长参观日本幕府将军的机会，了解西洋知识。当然，这种获得知识的方法是极不充分的，所获得的知识也极为有限，但通过他们，日本人了解域外的视野毕竟被拓宽了。兰学在50年中普及了日本全国，它已超过了医学领域，扩大到天文学、地理学、理化学、博物学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兵学、历史学等方面。从1720年起的百余年间，日本洋学者师徒相传，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对西方有所了解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仅绪方洪庵在大阪所设立的“适适斋”，自1832年至1862年间，各地前来就学者即达3000多

人。由此可知明治维新前西学在日本的传播阵容。与此同时，幕府自身也加紧吸收西学，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吉宗时代就已于江户城中吹上安装了测午表，在神田佐久间町设置天文台。1803年组织洋书翻译，1855年建洋学所（翌年改称蕃书调所），以荷兰学为主，以英国学为辅，用西方知识教育旗本这一高级武士阶层。1862年该校改称开成所，专门讲授西洋地理学、物理、化学、兵学、历史等课程，培养了大批拥有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幕府之下各藩也着力于学习西学。其中如长州藩为与幕府争雄竞长，破格起用下级武士，积极引进西方技术。佐贺藩为了铸造炮身，于1850至1852年建成西式反射炉（高温炼铁炉），这是日本西式机械工业之始。萨摩藩于1851年设冶炼所，制造化学机械，1855年建成综合性近代兵工厂“集成馆”。由此可见，日本全面资本主义改革虽自1868年明治维新时起，但在这之前学习洋学就已开始了。

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注意，可以说真正起始于鸦片战争期间。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中国作者仅出版了三部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其认识也极不全面。鸦片战争后由于海防的需要，中国士大夫中的少数人开始注意域外事情，诞生了最著名的两本书：一本是魏源于1843年1月编辑出版的《海国图志》；另一本是徐继畲于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这两本书主要贡献在于，不仅介绍了有关西方的新知识，而且对改变陈腐落后的华夏中心观起了重要作用。除上述两部书外，1840—1850年期间，还有22部有关军事技术方面的书籍问世。表明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

西方军事技术的意图。但魏源的著作并没有产生影响到推动社会改革的程度。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在东南沿海乃至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常态（例如，道光皇帝就认为签署南京条约是一种用小的代价“永杜后患”之法）。由于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所以，丧失了进一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机遇。

中国真正向西方学习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而日本明治维新也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但若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有本质的差别。

日本在江户时代末期，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已进入实施阶段，在时间上中国洋务运动要晚日本15—20年左右。明治维新虽然也发生在60年代，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但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一次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也作了一些改革，但并没有触及到封建政体问题，主要是把着眼点放在表面的富国强兵上。而日本却把重点放在政治改革这一根本性的改革上，把富国强兵作为其结果。正如家永三郎所说：“不言而喻，与德川幕府的消极态度相比，明治维新政府所执行的开国政策要积极得多，尤其是幕府吸取西方文化的范围仅限于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明治政府则试图进而学习西方近代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和经济机构。这一点可以说是很大的区别。”⁽⁶⁾这段叙述也适用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这样，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的发展取向，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并没有因洋务运动而建立起资本主义体制，并进而推进工业革命；日本却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实现了社会的资本主义变革，加快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建立起了东方第一个近代民族国家。

从上述对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状况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中日社会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到甲午战争时，中日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已经出现了巨大差异，可以肯定地说：甲午战争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的封建因素还很浓重）与一个古老衰落的封建国家的较量。

（二）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未能及时把握新的历史机遇的惩罚，也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的丧失；而对于日本来说，甲午战争不惟是“天佑”，还标志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开始。

甲午战争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在中日两国近代史及远东国际关系史上都成为划时代的转折点。甲午战争使日本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它攫取了台湾，可以据而南进；控制了朝鲜，可以窥伺中国东北。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总之，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难怪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胜利的消息后激动得老泪纵横了。他说：“回顾一下社会，虽然还有许多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是全国整个局势一直是进步的，逐渐向上，数年之后即大显其形，如‘日清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只有活到今天才能看到这种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是不幸的，我真想叫他们也看看这种胜利！每当想起这点来都要使我落泪。”⁽⁷⁾福泽站在民族利己立场上，对这次决定日本国家命运战争胜利的“庆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甲午战争获胜对日本的意义。

首先，日本利用从中国勒索的 23000 万两白银进行货币改

革，确立金本位制，与国际货币接轨，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有利于稳定币值，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其次，加上甲午战后其他有利条件，促进了民间工业的发展。以纺纱业为例，1907 年与 1897 年相比，纱锭数增长 2.63 倍，纱产量增长 2.74 倍。1897 年，日本纱出口量开始超过进口量，一跃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棉纱出口国。出口对象（以 1905 年为例）中国占 86%、朝鲜占 9.8%。⁽⁸⁾

1897 年拨款 1920 万日元，在八幡（福冈县北九州市内）等建八幡制铁所。1901 年开始投产，当年仅产铣铁 30000 吨，钢材 3400 多吨。1908 年达到了年产钢材 9 万吨的目标。⁽⁹⁾这座钢铁厂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的产业革命已从轻工业领域发展到重工业领域。

再次，甲午战争的胜利又刺激了日本军阀更大的野心。俄、法、德迫使日本退还辽东，这在日本统治阶级中引起极大愤懑，有人在议会中说这是“千古未有之大辱”。⁽¹⁰⁾日本军阀山县有朋在关于“战后经营”方针的意见书中强调：“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化为乌有，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在“卧薪尝胆”口号下，日本统治者制定了 10 年扩军计划，陆军增设 6 个师团，现役军人从 7 万人（1893 年定额）增至 15 万人。海军建立“六六舰队”，舰艇总吨位自 6.2 万吨增至 26.4 万吨。全部扩军预算约 2.8 亿日元。其中约 2 亿日元来自清政府的赔款。由此可见，战争赔款也膨胀了日本军事力量，为其称雄东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国际上初步树立起了东方强国的地位。在此次战争的 40 多年前，西方列